

“申硕得博”：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上的佳话

■吴锡平

在中国学位授权与研究生教育历史上,扬州大学是起步较早的高校之一。早在1962年,原苏北农学院“作物栽培学”等2个专业就开始招收研究生;1978年,原江苏农学院“兽医微生物学”等2个专业恢复招收研究生。1981年,原扬州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获批成为中国首批博士学位授权点。这个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获批,是一段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上的佳话。

意料之外的博士点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开始恢复。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1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于1981年1月1日起实施,标志着学位制度的创立。与此同时,国家开展了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的审核批准工作。

扬州师范学院接到通知后,试报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任中敏教授为硕士生导师。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主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说:“扬州师老不当博导,我们不好意思当博导。”北京大学余冠英教授附议:“我也有同感。”最后委员会一致同意,批准扬州师范学院设立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这是中国首批文科博士点之一,任中敏先生也成为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凭借词曲学、戏曲理论和敦煌学等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早已蜚声海内外的任中敏先生,已是85岁高龄了!这个意料之外的博士点,为1992年扬州大学合并办学以来,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历史贡献。

这可能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也是一段尊崇学术、正本清源的学林佳话,但其背后却饱含着时移世易、岁月蹉跎的辛酸与无奈。

一生流离在南北

任中敏一生颠沛,历经坎坷,但对教育和学术研究矢志不移。任中敏,名讷,字中敏,号二北,生于1897年6月6日,其名与字取自《论语》“讷于言而敏于行”。任中敏少年聪慧,6岁开始识字,15岁考入常州第五中学,19岁转入扬州省立八中。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与他一同考入的,有他的扬州同乡朱自清,以及罗常培、张闻天。

任中敏就读北大的第三学期,受到词

曲主讲教授、曲学大师吴梅教授的赏识,开始专攻词曲。1920年夏,24岁的任中敏从北大毕业,先后执教于南京省立第一中学、江苏第五师范、江苏第八中学等,1951年任四川大学文学教授。此后,屡遭困厄,长期失去教育学生的资格。生性刚强的他刻苦自励,不屈不挠地开展学术研究。居住在成都焦家巷一间阴暗狭小的房间里,他白天背着装有热水瓶、旧日历纸片的背篓往图书馆读书,晚上整理所抄录的资料,凌晨时伏案写作。在中国的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对萧条的时期,但任中敏却使它成为其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

1955年,任中敏完成并出版了《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曲初探》两部著作。1962年前,任中敏以“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的身份,撰就了《唐戏弄》《教坊记笺订》《唐声诗》《优语集》等4部书稿。“文化大革命”毁掉了他的全部手稿,包括篇幅达数百万字的《唐宋燕乐集成》,但他利用劳动放空的业余时间编著了《敦煌歌辞总编》。这些著作开创了唐代文艺学的研究新领域,创立了“任氏散曲学”,使他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词曲学大师和近代散曲研究奠基人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敏的学生蒋南翔恢复工作,出任教育部部长,随后到扬州考察。戴步瀛、童伯璋等从外地赶到扬州,在扬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前见到老同学。当时正是“落实政策”的高潮,他们都过来了,但老师还在四川受苦,希望落叶归根,完成最后六本著作。”蒋南翔回京后即与时任中宣部部长兼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商量,先将任老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作为过渡,然后回扬州。1980年,84岁高龄的任中敏回到阔别40余年的故乡,到扬州师范学院任教,自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和传道授业生涯的又一段辉煌。

丹心不辞桑榆晚

获批博士点,耄耋之年的任中敏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和精神,全身心投入,克服人事上、物质上的重重困难,推进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的建设。

1983年,任中敏的首位博士生王小盾到校报到,投入先生的门下。任中敏对他要求严格,要求他“每年至少工作三百六十天,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同时他手书一纸,贴在墙上:“博士研究生到毕业时必须遵守部颁标准,能于拿出学术研究上的某一种创



任中敏先生(左)与他的首位博士生王小盾

这可能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也是一段尊崇学术、正本清源的学林佳话,但其背后却饱含着时移世易、岁月蹉跎的辛酸与无奈。

造性的成果。”以此提示学生:要抓紧时间,养成紧张读书的习惯。

学校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则逸闻,有一年,王小盾的爱人来看他,任先生破例允许王小盾第二天可以推迟一个小时上课。次日,他在家等到7点半,王小盾还没有来,他就拄着拐杖,到王小盾的宿舍前敲击窗户,朗声喊道:“不要从此君王不早朝!”

2017年任中敏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校举办学术论坛,王小盾教授在大会上发言里深情回忆:“他本人就是用小跑的步伐度过了一生的,我必须适应他的生活节奏。另外,他已经87岁了,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并不确定,所以他有强烈的紧迫感。实际上,他让我每天早晨陪他散步,也出于这种紧迫感。他的本意是:每天给我一次鞭策,使

我不至于成为宰予。”

据王小盾回忆,任先生有两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一句是“不能抬不起头,过不了江”,告诫学生勤勉求学,另一句是:“扬州人不是豆腐。”任先生用这两句话告诉我,扬州师范学院培养的博士生,其水平决不能低于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王小盾记叙述道,“这反映了任先生的自我要求,也反映了任先生的一个指导思想:要让学生永远有提升的空间。”

任中敏晚年时期,学校为抢救、传扬他的学术,先后为他配备了多名助手。20世纪80年代后期,扬州师范学院成立以他为名誉所长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所,成为他的集体助手。当他以90岁高龄招收第二届博士生李国平时,成立了以任中敏为组长,李坦、胡芸为副组长的博士生指导小组。他招收的第三届博士生李昌集,则由徐沁君、谢伯阳两位教授协助指导。

任教之余,任中敏对《敦煌歌辞总编》进行了细致的编校和补订,1987年他90岁那年,这部煌煌巨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庆祝会上,任中敏回忆30余年来撰著《唐艺发微》的经过,风趣地说:“我这辈子就是干的敲锣卖糖!”在场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谭佛维教授即兴在签名簿上留言:“巴蜀维扬,九十星霜;半生事业,敲锣卖糖。”任老阅后大喜,请书法家书写成条幅悬挂于客厅最显眼处。

1991年12月13日,任中敏先生病逝于扬州,终年95岁。

追本溯源忆先贤,守正创新写新篇。经过近40年的发展,扬州大学现已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47个,博(硕)士专业学位类别21个,覆盖了12个学科门类,形成了学科基本齐全、布局相对合理、类型比较丰富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学科事业的蓬勃发展是对事业开拓者的最好纪念,这份成色十足的“成绩单”,也足以慰藉任老开创这份基业。

2007年6月6日,是任中敏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学校在他晚年生活过的宿舍楼旁,为他塑了铜像,并将旁边的池塘命名为“半塘”,由他培养的第三位博士李昌集教授手书刻石,矗立于铜像东侧。塑像与碑石,相得益彰,气度超然。半塘与聒声中的著名风景名胜区瘦西湖连道,里面种植荷花,每年夏日,清风荷韵,飘逸飘香;冬日池塘清浅,残荷碎萍,于枯瘦中益显风骨。如今,这里已成为扬州大学一处著名的校园人文景观。(作者系扬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 打造校园文化新地标

■本报记者 黄辛

有一个地方,在校园中静寂伫立;有一个地方,于船帆间一览千年;有一座百年建筑,矗立起上海交通大学校园的文化新地标。这个地方,就是国内高校最早的航运类博物馆——董浩云航运博物馆。这幢坐落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东北角,中西合璧、质朴典雅的二层小楼,在2003年,与一位航运巨子的梦想不期而遇。从牌匾上的红纱被掀开的那一刻起,便吸引了众多目光和无限回眸。

如今,她已过了15岁,青春年华,热情洋溢;生机勃勃,意气风发,正可谓“小楼春色关不住,似有涛声入梦来”。

1月18日,“浩航之魅——纪念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建馆15周年活动”暨“浩航之魅”纪念特展举行。

航运巨子 与交大小楼的“邂逅”

董浩云先生原籍浙江定海,“世界七大船王”之一。在上海出生的董浩云在孩提时就爱上了船。青年时代的他目睹了西方各国船只在中国内河及沿海四处横行,便暗自下定决心,要“为国人争光”。24岁时,董浩云成立了自己的船务公司——中国航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几十年间他开创了在中国、亚洲和世界航运史上的多项“第一”,被誉为“现代郑和”。他热衷教育,早年就对交大颇多捐赠,包括捐建了文治堂,为美国校友会捐款设立了“董浩云讲座”。1982年,董浩云因突发心脏病,在香港逝世,享年70岁。

新中院建于1910年,早期西式建筑的“康白渡式”(Compradonic style)风格,小楼高两层,口字形平面,青砖墙面,红砖腰线,外围有贯通四周的走廊。内设楼梯,中间设有天井,高挑轩敞,斜顶是通透的玻璃棚。这幢小楼是校内第一幢独立的学生宿舍。抗战期间被日本宪兵霸占,新中国成立后,改作院系办公用房。虽历经磨难,但建筑总体风格和空间形态还是保护得很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董浩云长女董建平一次在整理父亲日记时,发现他生前有兴办一个航运博物馆的计划。她还从日记中找到父亲结交的30多位交大人的名字,如顾毓琇、王安、赵锡成、卢燕等,一生爱船的父亲与交大又如此有缘,于是便有了在上海交大建航运博物馆,一圆父亲心愿的设想。

上海交大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发展历史悠久、科研实力雄厚,学校早年便有意建立一个船舶楼展览室,而建立航运专业博物馆也正符合交大发展博物馆事业的长远规划。因此,当董浩云先生子女向交大提出建设一个航运陈列室时,立刻得到交大的高度赞同和大力支持。2002年,上海交大和香港董氏慈善基金会共同出资,这所国内高校最早的航运类博物馆——董浩云航运博物馆正式开工建设。

十五载经典传承, 打造文化新地标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展厅面积600平方米,藏品1100余件。这里有中国古代原始渡水工具——台湾竹筏,同时陈列创造了中国千古史诗绝唱的“郑和宝船”,而清代的五桅沙船再现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



博物馆展出的清代五桅沙船等。

上海交大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发展历史悠久、科研实力雄厚,学校早年便有意建立一个船舶楼展览室,而建立航运专业博物馆也正符合交大发展博物馆事业的长远规划。

市昔日的繁盛。二楼展厅,陈列着董浩云先生一生创造的伟大壮举;由英国皇太后主持下水的“伊丽莎白”号,承载着他生前对教育事业的高度热忱。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巨人”号船模寄托了华夏儿女振兴民族航运事业的伟大决心,还有一张张泛黄、饱含历史记忆的图片资料等,都向来访者倾心讲述了董浩云先生远大的抱负、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成就,弘扬了中国博大精深航运文化,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巨轮”在国际化的海域中破浪前行。

开馆以来,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始终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办馆理念,充分利用已有百年历史且独具特色的办馆空间,举办了诸多跨界别、有影响的展览教育活动,涵盖了航运、校史、科技、书画、传统文化、西方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人手札等不同领域,得到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参观人数逐年增加,社会声誉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并当选为中国博物馆协会专业博物馆委员会常委单位、首批入选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会员单位,发挥着传承历史经典、教化育人的积极功能,成为大众获取丰厚滋养的生动课堂。

上海交大党委书记姜斯宪表示,上海交大正在全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希望坐落在交通博物馆将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理位置优势,海纳百川、拓展视野,发挥上海交大徐汇校区文化新地标的积极作用,致力于为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提供一流水准的历史、艺术、文化、科技展览展示与育人空间,助力学校全面推动文化育人和文化引领战略。

发挥自身优势, 创建文博品牌

根据上海交大“文化引领”战略,以及“双一流”建设对文博工作的日渐重视,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将充分发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具魅力的场馆空间,不断创新,开展多样化的社会宣教活动,打造文博品牌,开创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工作的新局面。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将进一步发挥文化育人的特点,为新时代立德树、人才培养工作和全社会的科学素质教育和弘扬爱国奉献精神作出独特贡献。同时,将主动对标一流,海纳百川,更加注重博物馆功能的发挥,更多关注历史、艺术、科学、音乐等方面的高质量展览和教育活动策划,逐步创建自身的品牌,提升场馆活力和影响力,力争成为有影响力的专业博物馆。

我和顾随先生手稿的故事

■刘玉凯

“一位正直的诗人,而同时又是一位深邃的学者,一位极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巨匠。”

这是我国红学泰斗、古典文学研究家周汝昌对于自己的恩师——中国韵文散文作家、一代国学大师顾随先生的评价。这位曾被誉“秉承周作人文学精神的诗词领域的评论集大成者”的文坛巨匠,不但培养了周汝昌、叶嘉莹等近现代文坛巨擘,也留下了足以等身的著作手稿。

很幸运,在一次意外中,我得到顾随先生的很多手稿,而这些手稿,也成就了我珍贵的一段回忆。

杂物中的文学珍宝

算起来,我应该是顾随先生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这句话没有说错,因为顾随先生的几代学生都是我的老师。但遗憾的是,直到先生离世,我都没有见过先生本人。

既然如此,我怎么会有的手稿呢?这就需要从“文革”说起。

“文革”开始时,我还是一名在河北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大学生。一心想读书的我,从一开始就对这场“文革”既不理解,也不情愿参加。然而,1966年春节过后,新学期刚开学,学校就要搞教育革命实践,让学生下乡到了河北的冀县建设分校,随后又从乡间“返校闹革命”,于是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文革”,我自然也被卷入其中。

在度过了运动初期的大混乱后,学校开始分派,彼此之间乱斗、冲突不断。1967年冬季是武斗最频繁的时期。我们的群众组织经常在留学生楼开会,而参加的人则是在校的本组织全体红卫兵。

那时的“小礼堂”没有桌子和椅子,大半是空空的,后面存放许多杂物,参会者到会场后,就只能席地坐下或者站立。我和部分学生常常躲到礼堂后面的杂物堆中找座位。那里存放着一些抄来的家具,我们常常一边聊天,一边翻看堆积的杂物。而就在一次偶



作者(中)与顾随之女顾之京(左),顾随弟子张清华(右)合影。

当时,我珍视这些手稿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我喜欢书法,顾随先生的字写得太漂亮了;二是担心这些宝贝继续遭折磨;三是我喜欢鲁迅的书。

当时,我珍视这些手稿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我喜欢书法,顾随先生的字写得太漂亮了;二是担心这些宝贝继续遭折磨;三是我喜欢鲁迅的书。

老实说,当时的我并没有觉得顾随先生的手稿有多么珍贵,以我当时的学术能力,也鉴定不了他手稿的学术价值。那时的人不仅是我如此,老师们也感到前途不可知,有的老师甚至将自己的藏书卖掉换了青菜。

然而,我依然小心地将那几本手稿带回宿舍,越看越喜欢。

当时,我珍视这些手稿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我喜欢书法,顾随先生的字写得太漂亮了;二是担心这些宝贝继续遭折磨;三是我喜欢鲁迅的书。

当时,我还见到有几张写着诗词的宣纸手稿,已经成了收拾不全的纸片。我努力粘帖也还是没能找全。

“文革”结束后,我得知顾随先生之女顾之京先生正在收集其父亲的遗物,就立刻将原物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先生,连一张实物的照片也没留下。有人说,从文物收藏的角度说,我是有这些珍贵遗物的所有权的,但我不想坚持这个权利。

手稿中的大师情怀

直到今天,这几本手稿的大概样子我还记得。《小说家之鲁迅》是毛笔小字行书,写得特别流利漂亮,用一张牛皮纸做的封面装订起来,封面上写了“小说家之鲁迅”。我在“文革”后期,常常拿出来对照着练字。

那是在1947年,顾随先生正在辅仁大学工作,是年10月,北京大学文学社举办鲁迅逝世11周年纪念晚会,顾随先生作了讲演。既然是晚会,自然不会讲得太多,《小说家之鲁迅》应该是单独为中法大学文史学会准备的讲演稿。文末有“1947年2月1日”字样。可见他对此是特别郑重的。我所收藏的《小说家之鲁迅》,其实并不是顾随的亲笔,而是周汝昌先生的兄长周祐昌先生手录的稿子。手稿的最后有“祐昌手录”字样。

《关于诗》也是十六开的纸本,用牛皮纸装订的,内文有“季羨”署名,确实是顾随先生的手迹,是很漂亮的行书。他的书法学的沈尹默,依我看来,不仅写得像,还将草章融入行书,有自己的创新,我有理由说学生顾随是超过了先生的。

《关于诗》稿末有“1947年8月13日